

帶錦襴袈裟取經，唐僧為何不常穿？

在中國四大名著之一《西遊記》的取經故事裡，唐僧有一件極具傳奇色彩的寶物，那就是錦襴袈裟。讀過原著或看過影視劇的人或許會有疑問，縱觀全程，唐僧極少真正穿上這件袈裟，多數時候只是將其妥善收藏，可即便如此，他卻始終將其帶在身邊，從未丟棄，讓人疑問：這是為什麼呢？

壓箱禮服：閒時折疊，遇聖才穿

按佛教老規矩，袈裟本是印度僧人隨身的「三衣」總稱，也就是安陀會、郁多羅僧、僧伽梨這三件衣服，各自有不同用途。

安陀會是五條布縫的「內衣」，幹活、睡覺時穿；郁多羅僧是七條布的「上衣」，日常禮拜、聽經時穿；最講究的是僧伽梨，九條到二十五條布縫的「大衣」，相當於現在的「正裝」，只有托鉢化緣、見國王或者重大佛事才會穿。

玄奘（唐僧）那身錦襴袈裟，就是觀世音菩薩說「閒時折疊，遇聖才穿」的僧伽梨，難怪平時捨不得拿出來。

袈裟傳到中國後，沒有一直保持印度原樣，早早就跟著漢地的風俗「入鄉隨俗」了。先說顏色，印度原版袈裟講究「壞色」，就是不用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這五種「正色」，專門染成渾濁的雜色，比如用樹葉、果漿調的木蘭色，為的是「毀其形好，僧俗有別」，讓僧人斷了對服飾的貪念。但到了漢傳佛教這裡，顏色慢慢有了講究，現在看到的僧伽梨多是赤色，七條衣、五條衣常用黃色，既保留了「壞色」傳統，又符合中國人的審美。

形制上變化更大。印度的袈裟要「繞身三匝」，可中國氣候與印度不同，冬天冷不說，傳統禮儀也不興露胳膊露肩。隋唐開始，袈裟的長度就悄悄變短了，不再追求「繞三匝」，更注重象徵性。畢竟僧人裡面要穿袍服，袈裟更多是披在外面當「法服」，尺寸小一點反而方便。還有袈裟上的「田相」紋路，也

是漢地慢慢定型的，五條衣是一長一短拚布，七條衣二長一短，大衣三長一短，像一塊塊整齊的稻田，所以也叫「福田衣」，寓意僧人能為眾生種「善因」，這可是印度早期「纓衣」（沒田相的袈裟）沒有的講究。

材質上也跟隨物產差異發生變化。佛教剛傳入時，中國僧人用麻布做袈裟，到了宋朝，棉花普及後就改成棉布；要是遇到信徒佈施絲綢，也會做成更精緻的袈裟。不過不管用啥料，「樸素」的原則沒丟，早期還有「糞掃衣」的傳統，就是撿別人丟棄的破布縫補成衣，提醒僧人安於清貧。

因此，「講究」的袈裟，只有正式場合才會拿出來「亮相」。比如唐代僧人，要是被皇帝召見或參加大型法會，肯定要穿最正式的僧伽梨；平時在寺裡幹活、唸經，穿七條衣或五條衣就夠了。最風光的要數「賜紫袈裟」，唐代官制裡，三品以上官員才能穿紫衣服，因此皇帝也會把紫色袈裟賜給高僧。唐詩裡說「滿朝朱紫貴」，能穿上皇帝賜的紫袈裟，在當時的僧人裡堪稱「頂流」，既顯佛法威嚴，也透著朝廷對佛教的重視。

玄奘帶著錦襴袈裟西天取經，不常穿正是因為它太正式。趕路時風餐露宿，穿樸素僧袍更方便；可一旦遇到國王、高僧，或者到了靈山見佛祖，這件「僧伽梨」就成了必備的禮儀服飾。難怪玄奘再累也會好好帶著，畢竟這可不是普通的「行李」，而是他取經路上最莊重的「精神徽章」。



▲左圖為中國影視劇《西遊記》中，唐僧身著錦襴袈裟；右圖影視劇《西遊記》中，唐僧著听衣。



▲左圖為中國絲綢博物館藏的薔地飛鳥紋綾海青衣；右圖為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的唐代白花綾禪。

日常「聽衣」：僧版漢服，「隨俗改穿」

另一個問題來了，既然玄奘不輕易穿錦襴袈裟，那他趕路、唸經時裹的素色寬袍是啥？其實這正是唐代僧人最常穿的「聽衣」。與袈裟這類「正裝」不同，聽衣是僧人「隨俗改穿」的日常服，照著漢服的樣子改，舒服又實用。

要聊聽衣，得先搞懂它和「製衣」（袈裟）的區別。製衣是佛陀定的「三衣」，是必須遵守的規矩；聽衣則是「靈活選項」，只要符合戒律，能順著當地風俗改。唐代僧人日常穿的基本都是聽衣，畢竟袈裟要「遇聖才穿」，平時掃地、唸經、化緣，穿聽衣才方便。當時的聽衣主要有三類：海青、直裰（duō）、偏衫，每一種都帶著濃濃的漢服影子，藏著不少貼心設計。

最常見的「海青」簡直是漢服的「僧版改良款」，腰寬袖闊，圓領方襟，跟漢代袍服幾乎一個模子刻出來的。但它比普通漢服多了不少佛教細節，袖口是縫死的，不像俗家袍子那樣敞著，颯風時不灌風，幹活時也不會勾到東西；衣領叫「三寶領」，用三層布疊著縫，暗合「佛、法、僧」三寶，既結實耐用，又有象徵意義；衣領前面還繡著五十三道藍線，叫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」，講的是善財童子拜訪五十三位名師求道的故事，既添了佛法味，又讓衣領不容易磨破。

海青的適用場景特別廣，堪稱唐代僧人的萬能常服。在寺裡日常走動，比如去齋堂吃飯、跟同門聊佛法；或做些輕活，像整理經卷、給佛像擦灰；就算出門化緣，穿件青黑色海青走在路上，既顯僧人身份，又不會像穿袈裟那樣惹眼。而且穿海青還有規矩，在家居士只能穿青黑色，只有廟裡的長老才能穿黃褐色，顏色一看，就能分清身份高低，既守了禮儀，又不張揚。

再說說「直裰」，這衣服是聽衣裡的「實用派代表」，是把漢服的「偏衫」和「裙」拚起來改的。

最早印度僧人穿「僧祇支」，只蓋左肩，露著右肩，可中國不興露胳膊，北魏時宮人

就給僧祇支加了右袖，變成兩袖齊全的「偏衫」；後來僧人覺得光穿偏衫沒下裝不方便，又把偏衫和裙子縫在一起，就成了直裰。它既有上衣的袖子，又有下裝的裙身，彎腰幹活不卡襠，走路時裙擺也不會絆腿，簡直是為日常勞作量身定做的。

直裰在唐代僧人的生活裡，出場率比海青還高。在田裡種菜、在院裡掃地，穿直裰不怕弄髒；去山下挑水、幫村民做點雜活，穿直裰行動利索；就算在禪房裡打坐，寬鬆的直裰也比緊繃的衣服舒服。從龍門石窟的唐代造像能看到，不少弟子像穿的就是直裰，有的是半袖，露出裡面偏衫的窄袖；有的是長袖，胳膊上還搭塊帛巾，既實用又好穿。

敦煌莫高窟的壁畫裡更常見，畫中僧人要麼穿直裰挑水，要麼穿直裰講經，透著一股煙火氣，完全沒有穿袈裟時的莊重感。

還有「偏衫」，算是聽衣裡的「輕便款」，是直裰的「前身」，也是從漢服改來的。它交領右衽，袖子窄窄的，比海青輕便，比直裰簡潔，特別適合做細活。比如在藏經閣整理經書，翻頁時窄袖子不會勾到紙張；在禪房裡抄經，胳膊動起來也靈活；就算夏天熱，穿件薄布偏衫，也比穿厚海青涼快。偏衫還常跟其他聽衣搭配穿，裡面穿件貼身布衫，外面套偏衫，再繫條腰帶，既整齊又保暖，從炳靈寺石窟的唐代弟子像上能看到，不少僧人都這麼穿，裡面的偏衫露出交領，外面再披件薄薄的外衣，清爽又利落。

再看《西遊記》裡的玄奘，趕路時穿的其實就是聽衣，素色的圓領袍，寬袖子，跟唐代僧人日常穿的海青、直裰一模一樣。要是他天天披袈裟趕路，不僅扛不住風吹日曬，還容易招來妖怪搶寶；穿聽衣既低調又舒服，正好符合「日常便服」的規矩。這也難怪唐代詩人寫僧人，總提「方袍」「衲衣」（聽衣的別稱），卻很少寫袈裟，畢竟詩人看到的僧人，大多是在田里勞作、在廟裡唸經的日常模樣，穿的都是這些帶著漢服影子的聽衣，透著一股平和樸素的生活氣。

西行便服：平民「臻選」，因地制宜

歷史上真實的玄奘西行時，穿的不僅有「聽衣」，還有平民衣服。在風沙漫天的路上，平民服飾有時比僧袍更實用。

隋唐西北平民的衣裝，最講究「因地制宜」。就拿頭上所戴來說，男子日常最常戴的是能遮風擋沙的笠子和帕頭。敦煌莫高窟的壁畫裡的船夫、繅夫，頭上都頂著圓圓的笠子，這種用竹篾或蘆葦編成的帽子，既能擋住西北毒辣的太陽，又能在起風沙時護著頭髮，簡直是勞作必備。要是趕上稍微正式一點的場合，比如去集市趕集，男人們就會裹上帕頭，一塊布往頭上一纏，前面紮緊、後面垂著，既利落又顯精神，就連戍邊的兵士，朝廷發放的衣物裡也少不了「帕頭」這一項，可見它有多普及。

西北平民只選舒服耐穿的衣服。男子最常穿的是「衫」，尤其是短衫，長度到膝蓋上下，兩側還開著衩，不管是在田里耕作，還是在作坊裡織布，抬手抬腿都方便。莫高窟壁畫上耕作的農民、修房子的泥匠，穿的都是這種短衫，有的還在外面套一件「半臂」。這是一種短袖外套，長不過腰，兩袖只到肘部，幹活時套著能擋寒風，熱了隨手一脫也省事，連戍邊的兵士，軍裝裡都少不了半臂。

下身的褲子更有講究，平民穿的「褲（ku）」分單褲和復褲（夾褲），褲管都做得比較窄，

這樣走路、騎馬才利索。要是家裡條件差點，買不起完整的褲子，就穿「褲（kūn）」，也就是有襠的短褲，直接貼身穿，雖然看著樸素，卻比沒襠的「脛衣」方便多了。

隋唐時期，最能體現「西北特色」的還要數腳上穿的。這裡的平民可不像中原人常穿絲履，而是以皮靴、麻鞋、草鞋為主。皮靴大多是沒靴筒的「皮鞋」，用牛皮簡單縫製，耐穿還防水，不管是走在戈壁灘的碎石路上，還是踩在田間的泥地裡，都不怕磨壞。敦煌窟工製裡就常把「皮鞋壹量」當作雇工的工錢之一，可見它在平民生活裡的重要性。要是平時在家幹活，大家就穿麻鞋或草鞋，麻鞋用麻線編織，透氣又便宜；草鞋則是用麥稈或荻草編的，下雨下雪天穿還能防滑，雖然樸素，卻比任何華麗的鞋子都接地氣。

回望《西遊記》裡玄奘的錦襴袈裟，再看看隋唐西北平民的日常衣裝，忽然明白，袈裟是一種精神符號，而聽衣、平民服飾才是日常選擇。從玄奘的袈裟配法會、聽衣適日常，到平民的笠子擋風沙、皮鞋耐奔波，服飾的選擇始終圍繞不同的場景展開。這種對禮儀的尊重、對生活的適配，也是唐僧歷經萬難也要西行取經的精神動力。

作者 / 成蹊
本圖文均據「國家人文歷史」微信公眾號



▲左圖為大英博物館藏的易縣三彩羅漢像，身穿袈裟；右圖為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的南宋《玄奘三藏像》。



▲莫高窟第116窟主室北壁（局部），白袍內暗紅帶碧爛的半臂衣。